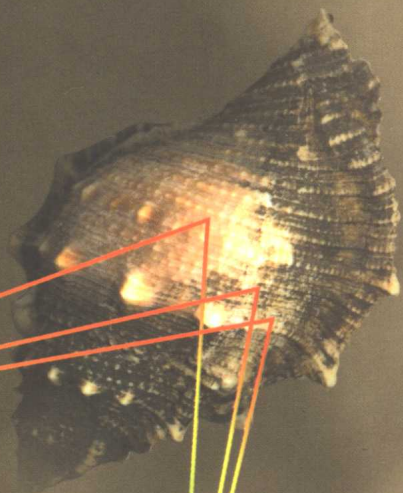


B in Fen Wen Cong

缤纷文丛



看不见的声音

KANBUJIAN DE SHENGYIN

崔卫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看不见的声音

KANBUJIAN DE SHENGYIN

崔卫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声音/崔卫平著.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1

(缤纷文丛)

ISBN 7-213-02021-8

I.看… II.崔…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899 号

看不见的声音

崔卫平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上虞印刷厂
(上虞百官镇横街路 3 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7.3 万
印 数 1-7000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021-8/I·18
定 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我学文学出身,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从未后悔过。实际上我越来越着迷于自己的专业。我从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是无限的。正是文学教会了我一道眼光:真正地关注自己身外的人们和事情。我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这个整天在公园消磨时光的人,那个在立交桥下支个架子替人理发的人,我的命运和他们相似。”文学把你放在无名的人们、无名的声音所处的境遇中去,放到不幸失事和失败的人们当中去,放到被“历史”的身影所掩盖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缝隙”中去,使得你与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们有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在阴暗的潮湿的街道,夜晚笼罩下的城市 and 大地,空荡荡的墙角的拐弯处,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尖锐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的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尴尬、无奈和失去耐心。

如果说我对他人的生活和痛苦有一种敏锐的感受,那也来自于我对自己的生活及其痛苦有一种敏锐的感受。一般地说,我有反省自己的习惯和能力,不回避查看自己生命的墙角,观察自身的那些脆弱、失败和阴影之处,谛听自己于彻底

孤独之中的呼啸。只是从对自身生活的全部矛盾和混乱中，才建立起对他人生活矛盾和混乱的理解和同情；从自身几乎失去全部力量的体验中，才建立了对他人生命的完全无力的体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几乎陷在这种混乱无力中不能自拔，无法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最终写作帮助了我。对我来说，写作如我在《今日读者》这篇文章中所述：“是把此时此地人们的故事和命运讲给彼时彼地的人们去听，是把此时此地人们的一种宽容与彼时彼地人们的一种宽容结合起来。”迄今我难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在我对他人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表述中，我感到自身也得到一种包容和接纳。

从那些掉在历史的“缝隙”之内的东西中，你还看到了什么？从生活和生命的断裂、接合、再断裂之处，你还得到哪些另外的内容？一种和不止一种的可能性。当你要想找出生活的某个清晰的轮廓，要从其全部混乱和埋藏中发现潜在的秩序和框架，只有把它们放在另一种光线和场景之下，从其可能有的面貌上来加以认识和研究。于是文学的工作也是一种有关可能性的工作，一种开放的、允许和鼓励想像力的工作。想像事物或许是另外一种模样？在眼前的对象身上，是否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它们的方式？在看似平淡无味的事物的外表之下，是否可能走出另外一副令人大吃一惊的不同面貌？这种情况是完全能够出现的。于是给自己预备好一份恰当的心情，随时准备迎接那些从天而降的东西，那些“不可能”的神奇的事物，并小心翼翼地尾随着它们，让它们带着自己去它们要去的地方，收获另外一种不同的景象和不同的声音。

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感谢尚未谋过面的、严谨耐心的编辑章依女士，感谢这套丛书的主编艾晓明女士，是她们使得我

这些年来着力最多的思考和写作,能够集成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

崔卫平

1999年12月18日

目录

自序 1

□写作的伦理

写作的伦理 3

文艺家与政客 11

回到文学本身 18

写作与不自然 24

个人化与私人化 28

今日读者 34

阅读翻译作品下的写作 41

小说和小说出版物 52

从阅读中来,到阅读中去 56

从另外一个角度向伟大的生活表达

敬意 62

□远方和阿里巴巴山洞

郭路生 71

海子神话 80

远方和阿里巴巴山洞 95

狂欢、诅咒、再生 106

我是费尔南多·佩索阿 127

可信赖文本 132

□我这一性别的写作

当代女性主义诗歌 139

在诗歌中灵魂用什么语言

说话 147

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154

文明的女儿 170

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 188

□为什么是伪问题

重读《罪与罚》 197

我们自身的限制和批评的限制 206

批判,以什么名义? 213

信仰生活 220

为什么是伪问题 233

从背后袭来的问题 242

神奇的甘地 250

写作的伦理



写作的伦理

上帝造人时肯定把善和恶按某种配方均匀地分配给每个人。于是我们就见到在每个人身上，他（她）的美德和恶行以此起彼伏、互相咬噬的方式并存着。一个人不能说他善得过了头，因为在他将自己弄得越来越好、越晶莹剔透时，他的恶还是在某处保留了下来，成为某个“除不尽的余数”或终归要现形的“狐狸的尾巴”。当然，事到如今，我们也不相信有寻遍其全身也找不出一点人性的“缝隙”的坏蛋。如果说“一不小心的恶”对于善良的人和“一不小心的善”对于恶毒的人都是一种“短路”的表现的话，那么，在人这种脆弱无定的东西身上，便不能不时时发生这种“短路”的现象。人的有限性还体现为他的善的智慧和恶的智慧都是有限的。在某个意义上，写作这种行为可以被看做“善的智慧”的体现。这倒并不是说，写作不多不少是一件劝善的行为，写作的人都有一副慈悲如菩萨的心肠（谁会这么以为？），而是写作中必须具备的意志品格、所拥有的无限坚持和耐心、寻求完美至每一个细节的种种表现，使得写作可以暂时并入“求善”一类的行为中去。何况还有写作时所产生和面对的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它能使人

平时的骄娇之气、世俗之气一扫而光,进入某种无傍无依、无迹无踪的精神状态,几乎类似于某种准宗教的体验了,宁静、干净而活泼。但是无论如何,写作者不可能通过写作而成为圣人,而“道成肉身”。写作的行为不可能取代真正意义上的“修炼”的行为。因为写作说到底是一项功利的活动,人们期待从写作中诞生的,不是一个好人而是一件好的作品。(当然更不是圣人,圣人也写作,但没有一个圣人是从写作中诞生出来的。)这件作品最终要离开作者本人交付到读者手中,成为某个社会和时代想像力、创造力的一个体现,一桩文明的财富。这就要求写作者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闪光之处投射到作品上面,把自己身上最好的部分交付给作品的整体和细节,把它们处理得如何毫厘不差、尽善尽美,而全然不顾他这个人为此可能沦落到何种地步,他的外形和内心如何被弄得凌乱不堪和难以收拾。至于那个“除不尽的余数”——写作者本人的人性恶,它可能在写作中得到部分的转化和升华,也极有可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处,始终未被触动过。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是意料中的:比较起一个人的作品越写越好,看上去这个人做人却越做越差劲。借用早期马克思的那种晦涩的句式,可以表述为:他的作品越有伦理(写作的伦理),他这个人便变得越没有伦理(做人的伦理);他的作品越完美,越耐看,他这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变得越苛刻,越怪癖,越难以与人相处。好作者都具有这样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的确,难道要一个写作者他的作品越写越坏、做人却越做越好、越流畅、越受到人们的赞美吗?据我个人平时的观察,很少有人因为写作而变得越来越高尚和高大,相反的情况倒是经常见到,一个好人因为写作,他的行为和言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写作的人就像专业的

精神病大夫眼中的从事业余心理咨询的人们,由于没有经过恰当的训练,掌握一整套自我保护的技术和措施,经常面对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使得他们把光明给予别人的同时,把黑暗却留给了自己。我在后面的《写作与不自然》一文中,列举了三位为人们所钦佩的大作家——卡夫卡、普鲁斯特和艾略特,实际上这是三位一个比另一个还要不自然的男人,写作使得他们和周围人们及环境的关系变得无限可悲和滑稽,和这样的男人接近的女人真是活受罪,当然也不是所有写作的人都那么令人厌烦、浑身毛病,但如果他们其中仍然有一些道德高尚的人,那只能说明这些人原先就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是从别的地方学来或继承了这些东西,并且为了要保持它们,这些人还要在写作之外作一些别的训练。

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和自身的人格之间的分离和分裂,这其实也是他这个人的自我分裂。雅斯贝尔斯甚至进一步分析过艺术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时所产生的另一种挫折感。他认为艺术家和哲学家一样,都追求一个整体。哲学家追求对世界的整体性解释,艺术家寻求对世界及自身的整体感受和表现。所不同的是哲学家是在经过无数的准备和努力之后,最终得到一个整体,即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艺术家每次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意味着一次整体的完成,一部作品便是一个小宇宙,但比起艺术家心目中感受中的那个整体世界,每部作品更像是一个“伟大的片断”,是从一个整体上撕下的碎片,不过是个片言只语的警句,甚至更像是习作而不是作品,“绝对完成的作品连一个也没有”。因此,艺术家于作品完成之际在体验到自己创作成功的喜悦时,同时还会感受到仍然存在于作品中的某些遗憾之外的另外一种遗憾,乃至痛

苦和焦虑。他的每一部作品成了对这个人本身的一种压力和威胁,当然也是新的作品产生的动力。

种种自觉和不自觉存在着的、原先的和因写作而产生的问题,使得写作者的心情经常处于晦暗之中,时时感到自身的欠缺甚至危机。然而在面对自身人性的有限和不足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些人强忍着,尽量和悄悄地把己的不幸掩藏起来,免得给周围无辜的人造成伤害(尽管这很难)。另外有人很可能变得需要这种伤害,把自己的缺点也说成优点,将其发展为不遗余力地攻击别人的武器,非常主观地将别人置于黑暗当中,通过这种途径使自己得到“洗礼”和“升华”。

写作究竟是不是一种“超凡入圣”的——或者与此相反,是一件“绝圣弃智”的行为,把它放在另一背景即我们所处的生存条件下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

弗吉尼亚·沃尔芙将真正的妇女写作看做是能“贴补家用”的那一种,而非是某个贵为夫人或小姐的人怡情养性的闲来之笔。沃尔芙的这个看法涉及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商品社会写作的本质。对如今的写作者来说,他不得不面对闹哄哄的文学市场,争取给自己的作品卖个好价钱,给他本人弄来一笔远非是可有可无的收入,说得深一点,这笔钱不仅是他这个人生活的保障(他的形而下的生活显然不只是某个“除不尽的余数”),而且是这个写作者想像力、创造力的保障。只有当他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他才能最终摆脱封建官吏制度下文人的附庸角色,不再隶属于某个身居高位的小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展开想像力地自由驰骋。此时他所面对的是和读者(自由的购买者)之间的互通有无,你给我一个真实的世界,我给你一个想像的世界,你给我一个镜子外面的世界,

我给你一个镜子里面的世界，你给我一套真正的住宅，我给你讲述一条虚构的街道上虚构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是一场公开的、平等的、互相情愿的交换，双方都纳了税款的，到这一步，称“作品”为“商品”没有任何贬损它的含义，无非是在肯定它所包含的劳动和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流通品的品质。以前的作家为什么老是受到批判，就是因为不承认他们劳动者的身份，他们同样也是“劳动创造世界”（当然是另一世界）和依靠劳动养活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他们当做了“治人”的那种人。关于写作者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和其作品作为商品的性质，本身即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天赋过人的本雅明在分析另一位天赋过人、才情横溢的现代诗人波德莱尔时，已经将问题阐述得非常清楚。他指出波德莱尔的作品和成就应归结为他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尖锐反应的结果：

所谓新奇的东西，即打破永恒体验——诗人在这种体验的魔法下陷入忧郁——的东西，不过是商品的光环。

作为一个长时间在街头踟躅、闲逛的“文人”，当他用“茫然、野性的凝视看着一切东西”时，这不过是他特殊的生产方式：

在街头，他把时间用来在众人面前显示其闲遐懒散，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行为像是告诉人们，他已在马克思那儿懂得了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众人面前延长闲暇时间对于认识他自己的劳动力是必需的，这使它的价值变得大得简直让人难以捉摸。

波德莱尔本人深知自己的这种处境和自身的所作所为。

他不只一次毫不留情地讽谕自己，讽谕诗人用自由换来冷酷现金的令人难以恭维的地位，“为钱而干的缪斯”。但是，他仅仅在自我批判，没有将这一点弄成攻击他人的理由：

为一双鞋她卖掉了灵魂
但在卑鄙者身旁，我扮出
伪善的小丑般的高傲，老天爷耻笑
为当作家我贩卖我的思想。

将“田园牧歌式的写作”和分工的现代社会中作为“生产劳动的写作”区分开来，同时也在提供着另一界限：与“有关圣事的写作”的区别。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试图通过写作来“超凡入圣”和通过写作实现某种“绝圣弃智”，可以放在同一层面上来加以考虑，因为“绝圣弃智”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神圣”和“智慧”，正像艾略特所说的，褻渎只是信仰不完全的表现，将它们统称为“有关圣事”未尝不可。在所谓“个人写作”的前提下，“有关圣事的写作”极有可能演变为有关个人的“得道”或“失道”的行为。这样一种写作和“田园牧歌式的写作”共同之点在于它们的不生产性质，作品只是附带的产物，比起其他什么东西来，作品的优劣成败仅仅是其次的事情。比如同样是写作中出现的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对于一个从事“有关圣事的写作”的人来说，这将可能成为写作的目的，处于这种心情之中是写作这种活动所带来的最大收获，从中他知道自己灵魂正在得到拭擦，它无挂无碍，正在等待和捕捉下一个从深渊中涌现的句子或词。但对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写作”的人则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大俗人，尽管他会调整心境，使自己尽量进入某种最佳的工作状态（事实上为生计所迫，他也

没有什么有关荣誉之类的包袱要背),但归根结底,某种心情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附带的产品,是一种伴随状态,它给人带来道德上的满足充其量仅供归并到工作伦理中去,没什么大了不起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人所要追求的真正目标。他的兴趣是外在的(有关一件作品的完成、完美与否),而不是内倾的(有关这个人的“完成”。)这就像某个电视机制造商,不管他本人还是他的顾客,对他制造电视机过程中的心情并不予理会,万一碰巧这个制造商还是个“修禅”的,他拿电视机制造原理或他的管理规章制度当作“机锋”来对待,那也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他不能用这个来烦扰别人,更不能要求他的顾客和他一道修炼同样的学派,把购买和使用电视机的过程当做一项宗教活动,否则就是处于“黑暗”之中。当然,有人会立即反驳道,我们所说的“作品”是一件精神产品,它完全不能等同于电视机,这当然;但就我们这里涉及的劳动者和其产品的关系而言,既然同为劳动的产物,劳动者本人于其中都同样意味着一种巨大的付出,说得不好听一点,劳动对于劳动者的精力、才华、品德都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消耗,甚至损害;精神劳动者也不能避免这项活动对他本人的精神产生的消极、负面的影响,就像竞技的运动员在创出那些辉煌的记录和成绩的同时,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巨大的病痛和创伤一样。只是精神劳动者落下的某些精神上、心理上的疾病伤痛一般不易觉察得到,它们更容易招致种种误解,得到掩盖和美化。包括精神劳动者自己也常常弄不懂他某些精神上不适的真正来源,他们中的某些人发出的呻吟是针对另外一些对象的。老实说,当我读到波德莱尔给他母亲的信中写的“道德上的痛苦几乎是我唯一视为痛苦的痛苦”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我部分地